

120944 而未嘗思及唐高宗亦名李治也。其後李治蓋忽悟自己姓名同於唐高宗，在君主政體時代，常人姓名與古帝王相同，極爲不妥，而行用已久，又不欲盡改，於是將三點水之偏旁，減去一點，遂成「治」字，而仍字仁卿。李治改名在何時固不可考，然程棗碑題於金時，則作「李治」，而聶珪碑撰於元世祖中統時，則作「李治」，此可爲李治初名「治」後改名「治」之確證也。元道山與李治同時入，故其集中稱李治，或從其初名作「治」，或從其改名作「治」。蘇天爵在李治之後，故編國朝名臣事略及國朝文類，皆從其改名，定爲李治。明初

修元史，亦均作李治矣。吾人自應從其改名，稱李治爲是，然須知李治乃其初名，並非誤字也。
余攬作元道山年譜彙纂，涉獵金元人書，見李治李治以一人之名而諸書所記差不同，頗疑李治名治，後以誤同唐高宗之故而改名爲治。近偶與友人談及此事，友人持陳君文見示。余讀後，深佩其搜證之詳，考辨之細，因思昔日所擬，可爲陳君文作更進一步之解釋，故略加推論，成此短篇，敬質於陳君，及世之治金元史者。

戰後我國首都地理位置的商討

周立三

一 首都與國家之關係

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，最低限度必須具有兩個不可分割的基本要素，便是拉策爾(F. Ratzel)氏所謂一羣人民(ein Stück der Menschheit)和一塊有組織的土地(ein Stück organisierter Erde)，有了這兩個基本要素的密切結合，才能使國家成爲一個有機能及理性的個體。國家在牠的形成發展上須把握着地的空間，所以政治地理學的國家觀即認爲國家是空間的有機體。而這有機體的國家，自不能不有一個便於聯絡和控制各方的中心點，這中心點便是首都。每一個國家常藉此以爲繫領全國的樞紐，彷彿人體內的神經中樞一樣。不過首都與國家的相互關係，在最初期的發生過程上似原沒有嚴格的差別，尤其在乾燥地帶及山岳區域，人口密聚於沃地或谷地間，領土的擴張頗受自然的限制，像我國漢時的西域三十六國以及古代希臘的許多城邦國家，自無所謂首都與國家之分，因此政治地理學家蘇班(G. A. Sphen)氏嘗以幼齒長成樹木來譬喻首都長成國家。

城邦國家的首都與國家既屬一體，首都地位自必固定，於是首都之存亡便即國家之存亡。到了以後隨着國家領土不絕的擴展，首都的作用逐漸成爲國家的政治的中心，爲皇室宮廷或中央政府之所在地，即使牠偶被強敵所陷，國家本身卻不一定就直接立致毀滅。俄法兩國的首都在歷史上便都曾被敵人侵略過，而兩國的生命依舊持續不斷。這種實例還很不少。但是首都成爲國家活動的神經中樞機關之職能，卻固是而確立，並且逐漸傾向爲全國重心的趨勢也是很顯明的。所以一國首都地理位置的決定，常足以反映當時代國家內政外交的根本國策。

二 各國首都位置抉擇的原則及其趨向

一國首都位置的抉擇，不用說是應該建立在國境內最適宜的地點上，可是由於國土形狀的殊異，自然環境的差別，經濟基礎的不同，以及國勢的強弱，國策的變遷，在在都可左右其位置的變動。不僅各國之間顯難一致，即使同一國家往往因歷史的發展與時代的需要，首

都也未必永置一地。不過首都本身對於國家的職能既屬大體相同，那末也未嘗不可歸納成幾個共通所依據的原則：

一、爲國家統一上着想，首都位於國土的中央較爲得策。

二、爲國防安全起見，自然也位於領土內陸中心顯屬有利。

三、爲與各地聯絡便利與指揮迅速計，當據一國交通網的集結地點。

點。

四、爲利首都本身給養，則宜靠近全國經濟富饒的區域。

五、爲促進海上交通貿易的必要，位於海岸附近較爲優越。

六、爲便於國際間的交通或國策上的需要，與某方鄰國接近，

常把首都位置於國境的邊緣。

七、爲保持建都的傳統歷史關係，首都也常建置於古代名城所在地。

地。

綜上所述，擇定首都位置的原則雖多，但事實上固不能僅執一端，也不可兼顧所有有利的各點。所以一國建都地點之選擇不得不觀察當時一國的國情，換句話說，便要顧及地理環境和時代需要，來決定應該偏重於那幾個原則。

我們試考察近代各國首都地理位置的抉擇與遷移，似有逐漸強調於上述一二兩點的趨向，便是把首都設置在內陸國土中心安全地帶。

因爲首都臨靠海岸，大多是爲了利於發展海上交通與貿易，如像英國的倫敦(London)，挪威的奧斯羅(Oslo)，荷蘭的海牙(Hague)，以及日本的東京之類。然大洋海面在今日已非可靠之自然障礙，所以照

一般情形來講，這種臨海的位置與其他的邊緣位置(die peripherische Lage)同樣是處於國防不利的地位，並且在內政上也顯有缺點。因之

首都由海岸向內陸遷置，現今各國之中頗不乏實例。如土耳其由舊都君士坦丁堡(Constantinople)移治安卡拉(Ankra)，蘇聯從波羅的

海岸的列寧格勒(Leningrad)遷回莫斯科(Moscow)，印度自加爾各答(Calcutta)移向內陸的德里(Delhi)，南美智利舊都伐爾巴拉

案(Valparaiso)遷治新都聖地亞哥(Santiago)，以及澳洲建都坎伯

拉(Canberra)，都可舉以爲代表。再加北美加拿大的首府由魁北克(Quebec)而蒙特利爾(Montreal)而鄂太瓦(Ottawa)的移動，也頗有

遷治內陸中心的傾向。因中央位置恆爲最具防禦性的地理位置。所謂中央位置(die zentral Lage)自然並非嚴格指國土的幾何中心，因一

國的幾何中心在地理上是顯乏多大意義的。但是歐洲二十六個國家之中，首都佔據中央位置的卻只有五個，即西班牙的馬德里(Madrid)，

法國的巴黎(Paris)，比利時的不魯塞爾(Brussels)，波蘭的瓦沙(Warsaw)和蘇聯的莫斯科，其餘卻都屬邊緣位置。

關於首都位置中心化的傾向，而顯著能達到國家重心點之目的的，當首推巴黎，牠在以往任何世紀國內一切活動差不多皆以其地爲

樞紐，形成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的大基心。德國的柏林卻由於易北河(Elbe R.)與得河(Oder R.)等分支運河的互相聯絡，而變成最大的

內陸港化，再加以鐵路網的結合，幾乎全憑人力的經營才使牠成了全國的重心點。再次講到首都受傳統歷史影響而所謂世襲的首都，最好

以義大利的首都做代表，那不勒斯(Naples)是商業的，米蘭(Milan)是工業的，其地位的重要都遙駕於羅馬，但是在義大利民族心理上認爲古羅馬馬羅適合做永久的首都。即如法國的巴黎和英國的倫敦也

不免含有這種因素在裏面。

二 我國歷代首都遷建的考察

我國文化早啓，歷史悠久，而國勢的強弱，疆土的張縮，代有變遷，故首都的遷建也隨之相當頻繁。在先秦時代小邦分立，尙未蔚爲大國，自然沒有一個地點其重要性超乎全土其他許多中心，能獲得較長久的領導地位。及秦統一版圖以後，廢封建，置郡縣，國家行政區劃既定，於是首都的地位也隨之而確立。從秦迄西晉五百餘年間，首都的遷建幾不出長安與洛陽兩地，因渭河盆地及華北平原不特爲當時經濟的重心，也是我國早期文化的發祥地。以後長江流域土地日闢，人日日繁，同時北方游牧民族迭次入侵，造成五胡十六國的紛爭局

120946 面，戰亂相繼，領土離析，東晉被迫南遷，立都建康（南京）。南朝宋、齊、梁、陳先後因之。然北方雖歷遭戰亂而經濟基礎尚未全毀，且與西北外族接觸頻繁，陸路交通也仍有往來，於是繼有隋唐的復興，二代首都再回置洛陽與長安。而唐代的銳意經營西域及維護交通貿易，尤為國都北移的主因。可是以後海運日昌，西亞及歐洲各國對我國的貿易漸皆捨陸遵海，加以南方農業地理環境的優越，文物愈盛，財富愈足，全國經濟文化的要區因大勢所趨，已逐漸轉移東南，於是後唐以降，長安洛陽二舊都再不復能佔全國政治中心的重要地位了。五代之際建都汴京（開封），北宋繼續都此。及東北新興異族的契丹入侵中原，宋室被迫南渡，偏都臨安（杭州）。而遼則開始以燕京（北平）為統治的中心，其地處於遼東入關的孔道，介於黃土高原與渤海灣間之一重要據點。不久遼為金滅，金又被滅於元，這些相繼入關的北方民族，卻始終利用此一要隘地點為組織全土的政治中樞。到了漢族復興的明代，曾一度以南京為首都，但不久即重遷燕京，主要的目的還是在扼守從北方入侵者所取的通衢，同時以南京為行在，用以控制方輿未艾的東南經濟要區。以後另一崛起東北的滿族入關代明統治全國，繼續都北平逾二百年之久。民國成立，南京復一度被定為首都，然不久仍以古都北平為政治中心，直到國民革命北伐完成以後，南京又重建首都，以迄於這次抗戰開始為止。

綜觀這二千餘年我國首都遷建的史實，似可歸納為下列幾點：

- (一) 自秦代以後，真正繫領全國的首都地位始行確立。
- (二) 假如以累積建都年份較久的地點講，當以北平（八八四年）南京（三九六年）洛陽（三七三年）長安（三二二年）開封（一九五〇年）及杭州（一五〇年）為六大名都。（秦以前建都年份未一併計入）

(三) 試以此六大名都的遷建歷史，約略可分為三個時期；由秦至東晉為西部定都時期（長安洛陽），由東晉至北宋為西部與東部互都時期（南京、洛陽、長安、開封），由南宋至民國為東部定都時期

（北平、杭州、南京）。

(四) 因為全國經濟文化自西北逐漸向東南發展，以及國際主要交通由陸路轉變到海道，於是政治中心的首都也自西漸次東遷。

四 戰後應建都武漢的理由

今旁察近代各國建都的趨向，並縱觀我國歷代首都遷置的情形，在此抗戰建國的大時代中，對於今後首都位置的抉擇自不能不加以慎重的商討。我們要首當認清我國地理環境的特徵以及戰後重要國策的動向，約略言之，可析為下列數點：(一) 我國國土遼廣且連成一片。(二) 據陸臨海，海陸國境都很綿長，兼有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的特質。(三) 境內地形複雜，就大體上講，東部多寬廣平原，西部概為崇峻高原。(四) 東南與西北不僅地形各異，氣候也很懸殊，因此人口的分佈，經濟的發展也顯見極不平衡。(五) 黃河、長江、粵江、以及東北、遼河松花江均為我國大河，各自成獨立單元的水系，惟長江流域最廣，地位適中，經濟最富。(六) 四周重要鄰國，北接蘇聯，東鄰日本，西南與英法兩國屬地毗連。其中陸上國境與蘇聯接界最長，海面國境與日本接觸面最廣。(七) 我國在地理政治的發展過程上，是處於兩種勢力之間，一為屢代自大陸而來的勢力，一為近代從大洋入侵的勢力，故戰後國防建設必須海陸兼籌並顧，經濟建設必須使邊疆與本部平均發展。(八) 我國既為東亞和平的柱石，則今後不僅對大陸的東北及西北應加強控制，即於華僑經濟泉源所在的南洋也宜密切聯絡。假如按此各點再比照前述建都的一般原則以衡諸過去的六大舊都，實無一足以當現今首都之選。洛陽、開封、杭州自秦以後都非重要朝代久都之地，而各城所據的地理形勢，方諸全國，顯見偏狹，可不置論。至於北平建都年代最久，但除明季以外，多為北方外族所據立的統治中心，且地位過於偏隅，對南方經濟要區的控制力感不足。南京是受大洋勢力影響而崛起的一個都城，其地理位置自較北平為優越，扼長江流域的鎖鑰，位於異常肥沃的三角洲上，水陸交通又極便利。

不過與北平有同樣太近海岸的缺點，於國防上顯為不利。且對於西部高原的控制也似覺距離過遠，有鞭長莫及之感。長安偏居內陸，在全國地位上看到頗適中。但渭河盆地雖稱沃野，然以局面過小，實不足以供養一首都，在秦漢的時代尚且要仰賴巴蜀漢中，甚或遠求東部大平原的接濟，何況今日。且關中為「四塞之國」，形勢殊欠開展。南面屏障於峻險的秦嶺山地，北面環阻於崎嶇的晉陝高原，既乏水運之便，陸路方面也只掌握了一條東西交通幹線，雖或利於西北陸防的控制，而卻無便於南方經濟的啓用和海防的守備。因此我們認為戰後建都最適宜的地點，當取武漢。武漢據長江中游，當支流漢水的會口，地偏內陸，東距海岸約八百公里。而鄂中盆地的外圍山嶺，高度不

戰後應建都蘭州

——敬就教於錢賓四、王芸生、張君俊三先生——

戰後的首都應當在那裏？恐怕大多數人會說：「回南京」。本來也是，那裏有美麗的江南風景，有俊秀的蘇杭人物，煦和的氣候，美味的魚蝦，那一樣不比螺螄殼似的重慶，沙漠地似的長安來得好？所以戰爭才打出一點希望來，就有人在那裏作「蓴菜鱸魚」的夢了，而且作的人還非常多。我極同情這些人，但是我也不能不冷酷的提出來（因為這是冷酷的事實），戰後殘破危難的局面豈是「白日放歌須縱酒，青春作伴好還鄉」的時候？我們前面起碼還有十五年（三個五年計劃）勒緊肚皮建國的日子等着我們，所以當然我們也不能聽其自然的將自己放在長江裏順流淌下去。

不錯，南京是 總理定的都城，但大家應當知道這是海都，還有一個陸都在蘭州。為什麼 總理定了一個都城還不夠，再要定一個？豈不是有點畫蛇添足？這裏面是有深意存在着的。總理如在今天，

大，有利於防衛，卻無礙於交通。長江東西的水運與縱貫南北的鐵路也恰以此為交點，通達四方，便於控制。東南向海發展既極便利，西部高原由於長江漢水的深入也易於聯絡。所以自古以來即被稱為「九省之會」，也可想見其地位的重要了。我國國土遼廣，設若戰後要加強規復東北，重建西北及開發西南，則不妨分置北平、蘭州、成都為陪都，作三個補助據點，而此三地與武漢的直線距離且亦約略相等，指揮聯絡均不偏倚。且武漢為辛亥革命起義之處，也足以為獲取首都資格之一助。

三二，三，五於北碚。

朱文長

當亦不準備將戰後首都放回南京去。

為什麼？這裏打算就手頭這點貧乏的材料，將各家對於建都的主張做一簡單的介紹，然後再比較其得失，試作一戰後新首都建於何處的檢討。

一 張君俊先生的主張——建都西安

張君俊先生在他所著西安建都之研究一書中主張建都西安。他列舉了十幾條理由，今歸併其重複及不十分重要的，約可得以下七點：

（一）從中國歷史上看建都北方的朝代較建都南方之朝代長，從世界地理上看建都北方之國家較建都南方之國家盛（指北半球）。此由於清冷之氣候可使人工作效率高。反之，南方天氣炎熱，工作效率低。甚至居住日久，可使人種退化。